

寻求题材与技法的双重突破

——2018年长篇小说综述

◎ 刘小波

摘要：2018年是长篇小说的大年，作家们推出了大量的优质长篇作品。在题材上，2018年的长篇小说围绕民生主题奉献了大批力作，涉及养老、教育、户籍、楼市等民生主题；同时，2018年的长篇小说着力关注个体的成长，将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关联起来；历史探寻依旧是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很多作品都显现出一丝历史的魅影；在技法上，有大量的作品显示出一种新的动向，这既是形式上的创新，也是题材的延伸。这些作品与时代深刻接轨，切实反映了现实，触碰了每一位个体的痛点，让文学接上了浓郁的地气。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下作家们普遍有一种长篇焦虑，长篇书写整体上有量无质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作家与批评家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长篇小说 民生主题 成长 历史 小说技法

2018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年，老一辈的50、60后名作家们新作迭出，70后、80后新生代作家渐渐能成为文坛主力军，而90后甚至00后作家也开始为文坛奉献长篇佳作，丰富长篇写作的版图。在文本呈现上，既有《山本》《戊戌变法》《北上》等历史深度挖掘之作，也有《乳牙》《无尽之夏》《景恒街》等后青春写作，还有李洱历时数十年打造的《应物兄》、刘亮程的《捎话》等技法更新之作，以及《活水》《息壤》《大野》等女性作家对乡村的深刻描摹与底层的深情关注，精彩纷呈，佳作迭出。在题材上，2018年的长篇小说围绕民生主题奉献了大批力作，涉及养老、教育、户籍、楼市等民生主题；同时，2018年的长篇小说着力关注个体的成长，将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关联起来；历史探寻依旧是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很多作品都显现出一丝历史的魅影；在技法上，有大量的作品显示出一种新的动向，这既是形式上的创新，也是题材的延伸。这些作品与时代深刻接轨，切实反映了现实，触碰了每一位个体的痛点，让文学接上了浓郁的地气。

一、民生疾苦

关于民生主题的书写成为2018年长篇创作最为明显的特征。养老、教育、户籍、医疗、楼市、商战、环保、城市建设、校园暴力、精准扶贫等与普通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在今年的小说中几乎都有表达，文学介入生活的覆盖面更广，力度更深。

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①聚焦老年问题，小说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现状，理性透析生命

与死亡,采用“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叙述。小说使用了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这一场域和视角来安排结构,通过陪护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陪护老人的故事,由此反映中国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养老、医疗、再婚、儿女等,涉及老人的科学治疗、延年益寿、老年陪护等现实问题。小说讲述了有关老年问题的多个层面,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同时,更写出了人间的温情与关怀。于是的《查无此人》用悬疑的外衣包裹着一个关于医疗与养老的问题。子清在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后被迫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责,因此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被迫放弃了远行的理想,作品深刻、细腻地描写了都市养老现况,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代里,这样的记录极具现实意义。作者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她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将关系百姓日常生存的问题用小说表达出来。王手的《送行人手记》将笔触指向入殓师这一行业,关注人最后一程所面临的问题。蒋林的《最好的告别》也是对医疗、死亡等问题的透视。

残雪的《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聚焦乡村医疗主题。小说描写了中国乡村常见的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群体,透过这一群体反映了乡村医疗的现状,作者有过赤脚医生的经历,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有着切身体会。小说以包含关切的笔法对乡村世界进行了描写,写出了村子的贫穷、落后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落后,写出了赤脚医生的艰难与坚守,同时也写出了一种豁达的生命观和生命的韧性。当然,她并非仅仅书写一种职业,而是透过老中青几代赤脚医生的视角,描写了乡村的另一面,尤其聚焦了乡村的精神世界,这也回到了她一贯坚持的精神关照。

鲁引弓的《小舍得》关注教育问题,将教育问题上升为一种阶层焦虑,对家长们面临的补习、学区房、升学考试等问题进行了全景展示,是其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又一力作,小说的主题触碰了中国绝大多数家长的神经,冷峻直面中国教育现状。黄宗之、朱雪梅的《藤校逐梦》也是一部反映教育问题的作品,焦点指向海外留学,通过中国与美国三个不同的华人家庭留学的故事,艺术地演绎了两代人悲欢离合的境遇及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它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以及对名校过分痴迷的不良后果,青少年的成长与家庭、社会、学校的教育密切相关,同时,年轻人树立人生目标以及确立自我发展意识也特别重要。秋尘的《青青子衿》聚焦教育问题,书写海外求学的故事,将现实的教育问题与历史串联起来,有现实的关注也有历史的反思。小说将中国高中生安迪在美国从私立学校吸食大麻转向公立学校开始写起,对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与子女的沟通进行了反思,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小说穿插了海外生存梦与归国梦的对比以及生活的艰辛、被裁员之后的生计困难等,都指向个体的基本生存。央歌儿的《音乐老师毕高芬》书写了一位教副科老师当班主任的故事,由此串起初中阶段学生的面貌、家长的状态和教师生存状态,同时也有子女成长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一部聚焦教育主题的作品。於可训的《才女夏媧》则将笔伸向高等教育,书写博士的求学经历。

范小青《灭籍记》关注的是户籍问题,小说讲述了吴正好寻找父亲亲生父母的故事,最终引出一段特殊的历史以及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等一系列人物在这段历史中的离奇境遇。故事的真正主角其实是一种叫作“籍”的东西。籍是只是一张简单的纸,但却是一种契约、一种身份的证明、一种主体自我的确认,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

无论是送孩子时立下的契约、非特务身份的证明,还是房籍、户籍、个人档案都是如此。小说围绕“籍”展开,有三重叙述视角,讲述三段故事,最终回到“身份”这一根本问题上来。郊庙的《前妻的户口》关注的也是户籍问题,讲述了由一场离婚引起的户籍后遗症以及户口纠纷带给一大家人的困扰。

刘亮的《日子》关注房价,描述了几代人生存的不易,除了住房,还涉及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问题,是一种底层书写和民生关注。姜立涵的《大城小室》也是关注楼市的作品。马宇龙的《楼外楼》描写官场生活,但是更多的还是关注改制、分配、住房等问题,是城市发展与民生矛盾的书写。还有大量的市井小说,描写平常生活,关注百姓日常。盛可以《息壤》关注的是生育主题。小说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叙事,也是一种平常的生活写实。故事围绕一大家子人的生老病死展开,讲述了初家四代人的命运起伏。小说关注的是生育主题,甚至可以说是普通个体面临的生育困境。作者从子宫的角度切入,书写了一场场关于子宫的战争。小说通过描写初氏家族四代女人的不同处境与命运,写出了当代中国家庭所面临的复杂世情。

唐颖的《家肴》继续书写上海生活,用生活的细节真实描摹了上海的深度浮世绘,衣食住行与两性关系这些最具生活底色的话题成为她小说中心主题。小说以家族小说的笔法书写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写出了一部新老上海的食色录,其中心是一群普通人的家长里短。张哲的《是梦》、柳营的《姐姐》等都是对小市民生活的关注,也是一种民生书写。张平的《重新生活》是反腐主题,但更深层的是一种民生情怀,这是一种为人民的写作。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寻找出了一种腐败的源头,即民众也需要为腐败买单。从魏宏刚被带走后大量人的关注以及事情做实之后人们的谴责讨伐可以看出,这些人不过是在为自己寻求解脱甚至寻找新的靠山。小说还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书记在位时绵绵受到的优待,就连小区旁边卖早点的师傅都争着为她准备早餐,且“专座专吃”。这其实是隐射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崇官媚官,而正是有了“观众”的喝彩,“表演者”的表演才会越发精彩。当然,这些荒唐行为的发生本质还是与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有关。

生态主题方面,吴仕民的《旧林故渊》是一部关于生态发展的作品,小说书写了一个古老渔村的现代命运,描写了农村绿色发展的新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主题较为繁杂,但是涉及的主要还是生态环保问题,既关注现实中的物质生态环境,也关注人的精神生态,探幽心灵家园,发展与保护、财富与良知的斗争在小说中不断体现。其他关注精神生态的作品也很多。马拉的《余零图残卷》关注城市人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心理疾病的困扰,也是对精神生态的关注。王宏图的《迷阳》作品围绕季家祖孙三代的情感生活和情欲世界展开叙事,把有钱、有闲、有社会地位的阶层贪婪、肉欲、病态的一面展现得很充分,尤其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摹和揭示十分深入。姜玉琴的《断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写,通过女性视角,对当下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发出灵魂拷问。其以高校教师李粉的人生经历为主干,演绎出了三条互相纠葛的故事线索,折射出了当下高校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李西闽的《我为什么要呼救》是纪念汶川大地震的作品,同时也是精神疗伤之作,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有各自的伤痛、焦虑,也有每个人不同的处理方式。

人类的情感困境也不容忽视,很多作品对普通个体的情感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

画。春树的《乳牙》描写了一种常见的中年情感危机；叶辛的《上海·恋》依旧延续自己的知青书写，将目光转向爱情，小说中母子俩命运里的爱情经历，虽是都市小人物的故事，却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爱情观、婚姻家庭观和价值观的骤变；文清丽的《爱情底片》通过爱情主题展现出了20世纪末变革时代光怪陆离的生活，表现了转型期的人们精神生活与感情纠葛。宋尾《完美的七天》围绕的也是情感困境，通过婚姻线来书写人的精神困境和存在价值。亦夫的《被囚禁的果实》将笔触伸向域外，但文本仍是对普通个体精神困境的描写。七堇年的《无梦之境》则以科幻的笔法思考科技带给人类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对科技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科幻的外衣下是对人情冷暖、对现实与民生的关注。张辛欣的《IT84》也是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反思关注现世生活。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作家们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李尚龙的《刺》即是如此，小说为校园、职场、网络暴力发声，引发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从而行动起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小说对校园暴力、职场暴力、网络暴力的描写，很多来自于真实事件，能够引起读者共鸣。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在2018年引进出版，小说由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成，直指校园性侵事件，小说详细再现了女学生因性侵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现实关注与同情怜悯并存，具有很强的现实警示性。

扶贫是近年来民生的重要主题，今年的书写仍在继续。胡为民的《月亮村巨变》以川北一个贫困村为创作原型，以脱贫攻坚为主线，塑造了在脱贫攻坚伟业中的人物群像，最终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村民们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是扶贫题材的创新，切入角度有所不同，将贫困地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并未陷入观念先行与应制之作，反而是对其的一种纠偏。在视角选择上，十岁的孩童视角也是不错的选择，在限知的视角与全知的视角的交错中将扶贫面貌全方位呈现出来。该书表达了一种乡村的重建、乡土文明的重建，是新乡土文学观，既关注物质文明的丰盛，也注重精神家园的重建。扶贫也是扶志，陈又木最终能够生活自理，接受教育，自立自强，就是扶志的成果，是对人性、人情、人格的全方位重塑。破败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基本物质得到保障，卫生、交通、医疗、教育等得到全方位的改善。通过对人性的多角度挖掘，美与善不断在文中浮现。

葛水平的《活水》也表达了相似的主题。小说讲述了在山神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群人的日常生活，既是新时代的乡村创业史，也是对生活在底层群像的描摹。在时代浪潮之下，这片宁静的土地也开始躁动不安，人们也开始面临现代化的冲击。乡土书写自然面临一个现代性冲击的问题，这是作家无法回避的话题，虽然文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文本，但是遭遇的现实却让文学不得不面对这一话题。作者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了乡村重建，开创了一种别样的乡土书写模式，也在建构一种新的乡土文学观。

城乡书写仍是今年长篇创作的大宗主题。乡村方面，王方晨的《老实街》关注城市化浪潮，同时也关注了宝贵精神的传承。韩星孩的《村庄传》、陈玺的《塬上童年》、李瑾的《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张春莹的《双蕖影》、彭东明的《坪上村传》纷纷回望童年，眺望逝去的乡村。城市方面，王莫之的《安慰喜剧》用饱满的细节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当代上海文艺界全景图，是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小传，也是上海文艺生活，尤其是摇滚、爵士乐发展的见

证,记录了许多不为大众熟悉的乐团与音乐人。彭瑞高的《昨夜布谷》则以被遮蔽的上海为背景,描写小镇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对城市底层的关注也很常见,楚河的《城市民谣》描写了一群在城市最底层打拼的人们,社会转型带给他们一次次阵痛,而他们坚韧不拔,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依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艳齐的《城南食府》是小人物的奋斗史,讲述了兄弟两人北漂的故事,写出了小人物生存的艰辛与奋斗的勇气。王威的《在边界的那一边》是一群在海外打拼的勇士们的故事。其他还有顾前的《去别处》等。城乡关注与底层书写似乎最好诠释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底层人物很多时候失去了人的基本底线与权力,是文学让他们仍作为人而存在。这种境遇不只是凸显作家与作品的伟大与高明,而是进一步反衬出底层人物的“非人”境况。民生主题的书写让文学介入现实的力度更深。

二、个体成长

个体成长是2018年长篇小说另一大宗主题。商业题材在2018年取得了重要收获,而这些小说在描写商战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个体的成长角度展开。永城的《国贸三十八层》以三位跨国公司的普通女性职员为主角,演绎出一台精彩绝伦的谋略大戏。三人虽看似平凡,却试图扭转须眉大佬们操控的乾坤,小说把商战的阴险与残酷、情爱的忠贞和背叛、人性的善恶美丑描写得淋漓尽致。

杜斌的《天上有太阳》描写20世纪90年代一群人在珠海艰苦拼搏的故事,书写珠三角的太阳能发展史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期的人生百态。在几十年的商战过程中,也表现了主人公的努力、内心的挣扎和向善的成长过程。

腾肖澜的《城中之城》写的是国际大都市和金融中心上海的生活,通过对两代金融人日常工作和生活从容而细腻的书写,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盛大、复杂与坚硬,写出了这个世界人性的斑驳与复杂。同时,《城中之城》也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小说书写了外省青年陶无忌从底层努力成长的经历。胡悦也是从底层奋斗成长起来的青年形象。无论是有为青年还是问题青年,都写出了在金融行业、在国际化大都市青年成长的复杂性。

王洁的《花落长安》是女性商战主题,也是女性成长小说。方英文的《群山绝响》是一部自传体的成长小说,书写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笛安的《景恒街》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在资本运作下的兴衰史来写一群都市白领与创业者的拼搏史。此外,徐奕琳的《上塘夜色》等也和成长相关。

陈河的《外苏河密战》以战争为题,却是一部重要的成长主题小说。小说中战争是青年成长的背景,作者着墨更多的是年轻人追寻理想、探求人生真谛的成长故事,这些在越南境内为革命理想战死的年轻人很多都有原型,作者参阅了历史资料和当年参战老兵的回忆文章,用虚构方式写出了这个小说。成长的夭折是小说悲剧性的一面,也是将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们看,以此来铭记历史,警示当下。这种写作模式也是他创作风格的延续。《外苏河之战》中陈河透过像赵淮海这样的成长夭折书写,其实也对这种敢于牺牲的态度予以肯定,虽然夭折但是作者认可他实现了成熟,悲剧性的书写不光是对青年夭折的扼腕叹息,而是对历史深深的反思。

田耳的小说《下落不明》书写了一代人的成长,作者自诩《下落不明》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下落不明》中有大量的人物不断出场,有些贯穿始终,有些昙花一现,几乎每个人物都面临成长的尴尬,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多方面,既有底层困境、家庭因素,也有大的时代背景。比如耿多义成长期间受到同胞哥哥的欺压,甚至被打傻了脑袋;莫小陌的父母家庭分裂,父亲与自己的闺蜜纠缠不清,而自己的成长则受到母亲明总的干涉,连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也被控制,被硬逼着写武侠;欧繁则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因“超生”的原因东躲西藏。总之,这些人物后来的不幸或悲剧与这些尴尬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当下有很多的小说书写到成长经历,似乎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尴尬的,进而影响个体的一生,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成长小说似乎无一例外都是“青春祭”,小说中确实有大量的童年与青春记忆,但并不落俗,而是通过回忆为成长做铺垫,为理想唱挽歌,通过成长的复杂写出了人性的丰盈。成长与理想有着一定的关联,成长意味着理想的消亡,成长的代价就是隐没理想。但小说留下了诸多光明的尾巴,耿多义仍在坚持写作、欧繁与老莫相依为命,哥哥耿多好改邪归正,过上了正常安定的生活,只是耿多义苦苦追寻的莫小陌仍旧下落不明,这便是理想失落之隐喻。

个体成长与时代发展的结合是成长小说的普遍写作模式,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讲述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由青涩成长为中坚的故事。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刘书雷这样一个由书斋“博士”成长为服务改革“斗士”的文学人物形象,小说中多个人物一同成长。李铁的《热流》书写的是个体与民族工业一起成长的过程。小说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人公陈铁花是长门厂的一位普通女工,为了学习绝技,想办法出奇招,终于成为厂里的“技术大拿”。进入新世纪,陈铁花的徒弟已经成为工厂的中坚力量,面对企业合资等新情况,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发生了裂变,展开了大我与小我之间的斗争。

周涛的《西行记》是一部关于作家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作家用散文化的笔法讲述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西行故事,夹杂了很多作者的论述,故事性并不强,情节不断闪回,主要讲述的还是一代人的援疆故事与成长历程。

储福金的《念头》用倒序的手法回望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张晋中的一生。从他儿时的记忆,到校园的生活,再到一步步建立起商业帝国,直达功成身退,过起了隐居般的生活。一路上他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促使他一步步成长,在彰显了一种被成长的主题的同时,书写了一代人的成长,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比如张晋中成长期间受到多个人物的影响,包括赌棋者、姚定星、唐三娘等,但由于小说的幻境书写,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过也成了一个问题。不过,这些足以说明人物后来的不幸或悲剧与这些尴尬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张者的《远水》书写了一个“问题少年”黄老斜的成长经历与人格升华,是典型的成长主题,小说也是边疆建设者们的青春之歌,同时具有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味道。与上面的成长小说一样,也能从个体的身上感受到时代的、社会的变迁。黄老斜的经历始终和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承载着历史的、社会的丰富内容。作为一个群体或者个体,新疆兵团人都是值得纪念和永远铭记的。将个体的成长与一个群体联系起来,是小说的独到之处。

其他关于成长书写的作品还有很多,墨柳的《青涩年华》是一部青春成长主题小说,两个大学女生对诱惑的困惑与选择,是青春成长的疼痛书写。张柠的《三城记》通过个体在北上广三城之间因工作、学业乃至理想的穿梭与游荡,写出了个体成长的一种无序与无力状态。

有论者提出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成功的成长小说,而近年来作家们的写作成果可以说正在扭转这一局面。另外,2018年还有一部分小说以成长为主题,但是大多书写的还是个体在历史浪潮下的成长经历。比如董立勃的《河谷》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与感情的小说,作品同时挖掘的是一段特殊的屯垦戍边的历史,而当下很多的小说都有一丝历史的魅影在其中。

三、历史魅影

对历史的处理永远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很多作家仍孜孜不倦在探询历史书写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书写方面,徐怀中《牵风记》书写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事。李乔亚的《最后的58天》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大屠杀惨案这最后的58天渣滓洞监狱两牢房内共产党人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余之言之《密码破译师》书写革命战争年代密码破译师的神秘生活。彭荆风的《太阳升起》通过西盟佤族大头人窝朗牛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生活,描写了佤族人怎样从原始部落末期进入新社会的艰难曲折过程。张弛的《战马之歌》记叙红军远征河西走廊的历史。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对战争的反思,将其以法庭对质的形式呈现出来。

肖亦农的《穹庐》书写20世纪20年代蒙古族的历史。小说以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包括乌金斯克的大片土地划归俄罗斯为背景,讲述了以嘎尔迪老爹为首的乌金斯克布里亚特部落,在与沙俄、布尔什维克、日本等势力周旋、斗争,最后回归中国的故事。小说在历史书写的时候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将人性伦理作为小说主线,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复杂的人性来构筑故事,展现了历史的一丝独特魅影。

海男的《野人山·转世录》是一部关于时间、关于历史、关于遗忘、关于生命的小说。作者选择了极为宏大的一件历史史实,即关于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故事,这是一段值得礼赞的历史,作者在处理的时候采取了较为私人化的方式。小说通过一群因各种原因走上旅途的旅行者重返野人山的经历,穿插起对当年战事的回忆,在主旨层面表达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类个体带来的无尽伤痛,也表达了对老兵的致敬、对坚韧生命力的敬畏、对遗忘历史的痛心以及对当下生活一定程度的焦虑和批判。

刘醒龙的《黄冈秘卷》是一部致敬父辈、致敬历史的作品,是作者多年创作积累的进一步冶炼和结晶,也是一部深入历史之作,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若隐若现,还是小说人物的革命经历,都是历史的影子。作品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风貌,同时具有全景扫描历史的野心。小说线索繁复,主线是家族叙事,同时多条故事线并行不悖,写历史,也写当下;写风物,也写人情;写物质,也写精神;写父辈的革命史,也写父辈的爱情。小说重心是关于父辈一生的书写,但也有“我”与少川的情感纠葛,同时还有对孩童辈的描写。小说既展现出

作者的历史姿态,也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总体来说,小说是一部怀念故土故人之作,无论家族成员乃至普通人之间有多少的恩怨矛盾,最终似乎都得以化解,成为一部“和解”之书,这是一种典型的晚期风格和老年写作之衰年变法。

王安忆《考工记》依旧是一部以上海为中心的小说,作品以陈书玉平淡而孤寂的一生为线索展开,书写了上海的前尘往事,对历史进行了全新的开掘,显示出一位成熟作家创作上的人性关怀与技法超越。小说在时间上从20世纪40年代写到新千年,以陈书玉的一生为线,串起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与上海的变迁。《考工记》一如既往以上海这座城市为书写对象,叙事上有着诸多的延续,譬如朱朱去香港与《香港情与爱》的互文,关于手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与《长恨歌》以及与描述上海传统工艺顾绣的《天香》之间的呼应等。小说借陈书玉祖上流传下来老宅“煮书亭”书写老上海浮华背后的世态民生,岁月沧桑和历史之感充盈其间。

徐则臣的《北上》书写中国的运河,以一位外国人对中国运河实地考察为契机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李学辉的《国家坐骑》也是传统文化的回响,围绕着“义马”这一特殊的领域,将特殊的历史呈现出来,同时也书写了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愚石的《天虫》以蟋蟀文化作为背景和主题,小说透过玩虫的故事来进入历史。叶舟的《敦煌本纪》则为敦煌这块神奇的土地立传。

当下作家们的历史情结愈发浓郁,很多小说都会有历史的影子在其中。贾平凹的《山本》探寻一段特殊的历史,以此为切口,用传奇的方式虚构历史,落脚点仍在人上。老藤的《刀兵过》是一部革命史与社会变迁史,深层里表现了不变的精神传统,通过九里生生不息的书写表达了中国文化坚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存智慧。蔡俊的《无尽之夏》仍然在延续“萌芽系”的写法,将一个荒岛求生历险的青春故事用“后青春”的笔法描写出来,小说明显将1997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标识出来,历史魅影在小说中不断闪现。徐晓思的《归湖》是一对恋人被迫隐居荒岛的故事,而这不得已的举动更多地还是与特殊的历史相关。其他的还有乔盛的《滚烫的岁月》记叙“人民公社”的历史,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延续知青书写。陈玉福的《西凉马超》、费勤的《苍茫天地一醉翁》、胡小远、陈小萍的《蝉蜕》、柳岸的《夏姬传》等作品则从历史人物身上做文章。

甚至还有很多小说以现实生活为对象,却处处闪回历史,比如王锦秋的《月印京西》、秋尘的《青青子衿》以及前文提到的多部小说,都有历史的魅影时时闪回,不少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只是借史抒怀,以古喻今。很多史学家认为不可充分信任被书写的历史,因为任何历史在根本上都只是某种叙事而已,他完全取决于叙事人的态度和修辞方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承担了历史文本所无法完成的使命,达到了历史文本所很难达到的历史深度。历史是作家们的心结,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小说是在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做注脚,对历史的态度与处理模式是检验作家们最有力的方式。

四、技法创新

2018年还有一部分小说在题材上与前面的主题无异,但是在技法上有明显的创新,

或许可谓进入小说技法的新时代。这些小说以自身的文体见长,虽然是形式上的创新,也体现出创作题材的全面延伸。

《灵的编年史》是霍香结撰 15 年的心血写成的精心之作,表现为百科全书的样式,是汉语语境罕见的以知识想象为推动力与结构方式的长篇小说。小说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写法,作品的时间跨度是从大元即 13 世纪上下至 21 世纪中期,以欧亚大陆直抵中国腹地的空间幅度,转取中西方知识的精华,虚构了一种“法穆知识”,并以该知识波及的个人命运、历史褶皱、伦理转换为书写场地,展示出复杂的世界观和庞大的知识系统,并显现出向内探求的微妙和深度,显示了作者文字创世的野心与能力。其丰沛、精密、光润的细节,让人惊叹。

陈继明的《七步镇》是一个与他个人前期风格迥异的文本,也是一部与一般的小说技法十分不同的作品。比如,小说并完全不是一个按时间流逝线性推进的故事,而是不断闪回交叉重叠,时间成迷;又比如,小说没有严格意义的主人公,人物不断出场又迅速退场,虽然叙述者东声贯穿始终,但是它的前世似乎又是独立的主人公,演绎着另一种生活;再比如,小说很难概括故事梗概,故事类似块茎植物铺开,导致主题十分涣散,每一条故事线似乎都是主线又不完全是,多中心而无中心。《七步镇》是一种苦炼文本,将诸多的事件素材进行熔炼,最终提炼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练,只不过这个知识分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心理疾病究竟好了没有,患病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归为“狂人”一类,鲁迅笔下的狂人开启了小说的新时代,《七步镇》及其塑造的东声是否也有此野心?

范小青的《灭籍记》的技法也是更进一步,相较以前的单线叙述,这次将三重叙述糅为一体,围绕“籍”展开,故事层层推进,直至真相显露。作者使用了一种元小说的策略,不断跳出来告诉读者这是虚构,这是梦境,或者直接告知故事下一步的发展,甚至告诉读者故事有漏洞,不断讲述又不断解构,尤其是大量的讲述被叙述者告知是梦境,造成虚构中的虚构,有一种盗梦空间的感觉。小说结尾,又是一种亦梦亦真的场景,颇有红楼一梦的遗风。此外,作者的语言也进行了更新,更多的俗语、口语、流行语以及网络语言被安排进小说,使得小说有了另一种风味。

储福金的《念头》也在常规情节之外增加了不少内容,常常旁枝斜出,比如《聊斋志异》的反复出现、打狗运动中关于狗的生命思考,参观人工智能时的思考等。此外,这部小说中的禅宗意味浓厚,尤其是莲花的意象以及幻境的书写极具阐释的难度,第七章的“镜火”更是极具禅宗味道,很多小说语言可谓箴言。小说还有很多幻境书写,如亦真亦幻和灵魂出窍的描写等,这种幻境书写是当下小说非自然叙述的表征,其实也代表了人生的多样性与人性的多样性,“念头”这样的题目也有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意味。

李洱的《应物兄》笔触指向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但是书写的似乎还是底层多余人的故事。与此同时,小说更是一部技法更新之作。小说的小标题、人物的虚实相间、互文本的插入、大量古典文献的引用及注释的安排等,都显示出一种技法更新的渴望与尝试。

刘亮程的《捎话》既是一部历史之作,也是一部技法独特之作。小说将人、畜、灵同居共融,是极为晦涩难懂的作品,也是一部寓意深刻的作品,可谓超现实书写的典型之作。《捎话》情节奇谲荒诞无比,整个故事充满了非自然叙事与反现实书写,作者创建了一个关

于动物与人类的寓言式社会。异化书写在文学中较为常见,这是对时代反思最好的手段,卡夫卡将人变为甲壳虫开启了经典模式,被多次效仿,在《捎话》中异化书写在继续,库曾经骑着驴将满脑的昆经捎给其他人,在库的师傅去世的时候,口中吐出的是昂叭昂叭,这是驴的叫声,捎话人吐驴声,将人和驴融为一体了。到最后,库也发出了驴叫,谢的灵魂附着在库的身上,这种人与动物界限的模糊具有很深的隐喻性,继续书写着人性的异化主题,只不过,作者更进一步,他还写到了动物的异化,将动物异化为人。小说可以说是一部驴图腾,驴是小说一半的内容,与人的地位平起平坐,将驴与人同等对待也有深意。处驴谢是主要的书写对象,文中不断写到谢的原始欲望,但是在人的调教下一直压抑着,人的异化在这里被转化为动物的异化,这种关于动物性被驯服和压抑的书写可以说极具隐射意味。虽然在技术层面仅仅是一种反向模仿,但是深意无限,尤其是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警示作用不言而喻。李凤群的《大野》给这个年代的长篇小说提供诸种新的特质。^②人物与话语方式的高度协调似乎谈不上什么特别——虽然这方面普遍表现出无能存于现状——但两个女主人公就是经由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建起了一部作品的新而不怪的架构,容纳了四十年人间的心神。

2018年有先锋文学复活的态势。先锋写作继续追求形式感,追求完美的表达,却有完整的故事链与价值观,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马原的《姑娘寨》是一部元小说,同时融进了大量的真实事件,作者有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敬畏感,用隔空对话的方式与民族英雄帕亚玛对话,虽然最终帕亚玛不复存在,是儿子眼中的幻觉,但是没遇见不意味着不存在。现实与幻想彼此分割却又在姑娘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交织。作为50后的作家,他的精神追求和写作目标与同代作家是一致的,追求的是19世纪的那种经典文学,这与60后、70后甚至80后等践行的20世纪小说观念是不大相同的。因此,尽管他的技法时髦而新奇,骨子里却是对经典作家的致敬与回归,是对现实生活虔诚而热切的拥抱。

这种技法更新是当前在成熟作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当下很多作品都有此趋势。当下长篇小说备受诟病,就是源于他们缺少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故事清晰,主题豁朗,几无阐释的难度,有些作者便会反其道而行之,增加小说的丰富性,而增加了这些内容,会增加阐释的难度,也增加了阅读的挑战与趣味。这样的写作还与一种文本冗余有关,冗余的成分不多余,反而成为阐释多样性的突破口。复调小说让多个主题并行发展,让小说人物进行对话,彼此冲突。正是这样的写作模式,反映了生活的复杂与人性的丰盈,更能凸显作家对生活的把握与提炼,也显示出其作品全面介入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写作不完全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也可以实实在在。

新生代作家是当下小说技法更新的主力军。90后作家群体的崛起是近年文坛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些作家们的出现为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文坛创作版图。李唐是90后作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大量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之后,他推出长篇《身外之海》。小说描述了一大群年轻人,描写他们的日常,描写他们的爱情,描写他们与父辈的关系,描写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总之,绝大部分是这一代人的真实生存境遇。故事的引子是作为镇上警察的“我”破获镇上出现一只会说话的狼的案件,由此牵出镇上的一系列人和事件。小说虚实相间,想象诡谲,既展现了青春写作的肆意张扬,也明显流

露出了他们这一群体创作的不足。

当然,几乎所有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注重技法的更新,不过,小说技法更新的局限也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技法创新需要把握火候,过犹则不及。另外,在长篇创作高歌猛进的同时,作家们还是有一种普遍的长篇焦虑,不断追逐长篇,追求创作的速度,高产而低能,这些仍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问题。总体来看,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主要在量的层面爆发,出产量很大,长篇小说专号越来越多,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但太过激进的创作步伐导致很难有精品诞生。顾彬曾提出当代中国作家们大都不知疲倦,作品一部接着一部。中国作家们不知疲倦的书写状态可能是造成精品难寻的根本原因。此外,小说机制上同构化;主流的报刊、选刊、出版社、评论家构成了协同的圈子;长篇小说影视化,脚本化;读者阅读空间逐步压缩等问题仍然不可避免,这是作者及研究者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注释:

① 本文所涉及小说在期刊出版时间与单行本版权页时间均为 2018 年,限于篇幅,不一一标明,特此说明。

② 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语,《人民文学》2018 年第 10 期。

(刘小波,男,1987 年出生,四川广元人,艺术学博士,《当代文坛》杂志编辑,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